

【文史论苑】

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原因

董昊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清朝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对当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回顾这段历史,众多学者对察哈尔蒙古西迁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关注。通过研究相关资料发现,这既缘于清朝统治者为了屯垦戍边、牧放牲畜、解决生计以笼络人心,也是基于察哈尔蒙古自身农牧皆通的特点,是在统治者的决策、新疆发展的需求与察哈尔蒙古自身特点的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关键词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统治者;发展需求;农牧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25(2016)06-0210-03

收稿日期 2016-04-05

作者简介 董昊(1995-),男,山东淄博人,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

察哈尔蒙古西迁是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进行的一次移民活动,共分为三次四批:第一次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出发,共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兵丁,并携带家眷;第二次一千名携眷兵丁因为要解送数万只牲畜,因此分两批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先后出发;第三次则较为特殊,为四百余名察哈尔妇女,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出发。至于西迁的原因,通过对相关资料分析,可得出以下几点。

一、屯垦戍边为根本原因

统一新疆之后,清政府陆续向新疆迁入了满洲蒙古八旗兵、绿营屯兵、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以求达到“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圉而资控驭”^[1]的目的。统一之初,因地域广阔,原有的马兵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防务需求,而察哈尔蒙古擅长马上功夫,这一点恰好为清朝统治者所需要。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三十日,大学士傅恒在奏折中提出“今塔尔巴哈台等处暂停驻兵,其马兵尚

不足额三千名。惟伊犁系初始驻兵之地,所有驻守地方、巡查边界及承应差事均需马匹,应较其他地方多设兵丁,以壮声势。故此,除伊犁现有马兵一千五百名外,再增加马兵一千名,共设二千五百名马兵”^[2],加上回子各城马兵一千,乌鲁木齐马兵五百,共需要四千名马兵,察哈尔、厄鲁特兵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察哈尔蒙古兵丁将“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则嗣后即无换班之烦”^[3]。在察哈尔蒙古到达新疆后,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戍守着21个卡伦,巡查伊犁北路。

察哈尔蒙古在游牧之外亦可以耕种田地,相比于不谙农事的纯游牧部落,不仅可以开垦土地,加强对新疆的开发与统治,同时还可以自行解决粮食供应,减轻国家负担。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二十四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上呈的奏折中称“此项察哈尔、厄鲁特兵均系久居察哈尔地方之人,平素除业畜外,尚靠种地为生。现将伊等携眷移驻伊犁,理合计其生计之久远利益办理。想必其中会种地者颇多,若拨给孳生牲畜取孳之同时,又令耕田,则伊等有粮石收获,更利于

赡养家口,亦可多垦伊犁之地。着将此寄谕阿桂、明瑞等,令此项察哈尔、厄鲁特兵俱垦田耕种,其余均依伊等所奏。”^[4]察哈尔蒙古到达新疆后,由牛录统一摊派兵丁,每年额定种田兵丁为160人,收获的粮食除了留出籽种外,余下的按人口分发。察哈尔营成为新疆旗屯的重要组成部分,迎合了当时新疆急需开发的历史要求。

当时清政府在新疆屯垦戍边的需要,加之察哈尔蒙古农牧皆通的特点,这成为察哈尔蒙古西迁的根本原因。

二、牧放牲畜为直接原因

新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马成为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此外驻兵需要食用牲畜,屯田亦需大量耕牛,因此新疆牲畜需求大增,牲畜数量不断增加,乾隆本人也认识到:“必须设立牧厂,孳生牲口,方为永久之计。”^[5]“伊犁牧厂始自乾隆二十五年,陆续由阿克苏、乌鲁木齐并张家口外牧群达里刚爱等处运到孳生马一万四千零三十三匹,又陆续购买孳生马三千五百二十六匹”^[6],再加上孳生牛羊驼,总数在十几万之多,但善于游牧的索伦、蒙古兵丁数量仅有三百余名,分散于新疆各地,“因此处之索伦、蒙古兵无多,分牧此项马匹实属不敷”^[7],放牧需求促使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等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十七日上奏折,在奏折中他明确表示希望乾隆帝能从内地调遣部分察哈尔蒙古兵丁到新疆牧放马匹。“然若无蒙古兵丁,实于马匹无益,当有蒙古兵后,绿营兵得以改种地亩,可使一人所种粮谷赡养数人,且于众蒙古牧放此处各项马羊、驯化孳生马驹、割骗儿马等务皆有裨益。”^[8]此项提议虽被乾隆皇帝以“在伊犁既有蒙古兵,相应不必往乌鲁木齐另行调派蒙古兵”的理由拒绝,但不到一年之后,清政府便决定挑选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三十日,乾隆

同意大学士傅恒派驻内地兵丁进入新疆的建议,第一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兵丁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日启程。伊犁办事大臣阿桂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八月初九日的奏折中提出,将乌里雅苏台解来的三万只孳生羊平分给该批西迁的察哈尔兵丁牧放。乾隆二十八年(1763)派遣第二批察哈尔西迁新疆时,为了解送四万余只羊送往伊犁,特意从1000名察哈尔兵丁中挑选出500名兵丁,不携家属,分四队驱赶羊群率先出发,抵达新疆后这批羊经过清点成为孳生羊分给了察哈尔牧放。据《新疆回部志》记载,“孳生羊一十四万七千一百九十五只内,察哈尔营牧放羊五万四千二百八十七只”^[9],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这表明察哈尔蒙古已成为新疆牧放牲畜的主力之一。

无论是议奏奏折还是方志中对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前后牧放牲畜情况的记载,都可以看到解决牲畜的牧放与孳生问题是清廷让他们西迁新疆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察哈尔蒙古擅长放牧的特点在西迁中起了推动作用。

三、解决部分察哈尔蒙古人的生计为间接原因

清政府以单身贫困作为挑选察哈尔蒙古兵丁的标准,按照征战兵之例赏给察哈尔兵每人三十两,盐菜银照发,并帮部分欠债人免去债务,这样可使“无钱粮者得食钱粮,于其生计亦有裨益”^[10]。对到达新疆后的安排,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奏折中称“奴才等遵旨择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之地,计其足食,且又不误牧放及承应差使,通融耕田,以负圣主体恤察哈尔、厄鲁特等,使其生计丰裕之至意外。”^[11]这直接体现了清政府让部分察哈尔蒙古人西迁是以解决其生计为目的。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二十四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在奏折中称“惟伊等初到此地,并无债务之累,而所有得给之项,亦极

丰足,奴才等趁此之际,留心管束察哈尔、厄鲁特等,令其勤奋种田耕作,繁育牲畜,根除任意糜费、好逸恶劳之习,以期伊等生计日渐安顿,永久富裕。”^[12]西迁后的察哈尔蒙古人不仅在放牧时可以得到口食羊,还可以耕种田地,相比西迁前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甚至在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还赠与他们众多生产生活物资。对于这种政策,察哈尔蒙古“众人皆合掌告称,此实乃圣主体恤我等下贱贫困蒙古臣仆之隆恩”^[13]。此外,“圣主为利于单身贫寒者养生之道所施殊恩”“贫困蒙古人等亦可永承皇恩”^[14]等类似语句在诸多大臣的上奏中频繁出现,可见这部分察哈尔蒙古人生活得到保障,对清政府的西迁决定充满感激之情,也使得乾隆皇帝声望上升。

由此可见,解决部分察哈尔蒙古的生计问题,以减轻国家负担,笼络人心,这是清政府选择这部分察哈尔蒙古西迁的间接原因。

四、西迁察哈尔妇女以解决部分厄鲁特男子婚姻问题

除两次西迁携眷察哈尔兵丁移驻新疆外,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还买取了总共420名察哈尔蒙古寡妇、女孩解送至新疆。这段历史为众多学者所忽视,但作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

乾隆二十九年(1764)六月初六日,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在奏折中称“着派柏堃、留保住赴察哈尔地方,会同巴尔品買取蒙古寡妇、女孩,由巴尔品酌情派人,乘便陆续解送伊

犁,嫁给厄鲁特单身男丁。”^[15]其中十五岁以上的包衣女孩174名,四十岁以下的包衣寡妇84名,自愿去往新疆的察哈尔旗女孩80名,寡妇82名。这批妇女于当年抵达新疆,除去路上病故46人以及年老残疾无法嫁人者31名外,剩下347人。“除将此三十一名妇女分别交给察哈尔昂吉瞻养外,其余寡妇、女孩,令领队大臣观音保,按厄鲁特昂吉无妻厄鲁特及新编察哈尔两昂吉无妻厄鲁特来投时间之久远,尽先嫁给。”^[16]将她们西迁新疆的直接原因是解决厄鲁特单身男子的婚姻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以此来消除新疆厄鲁特中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维护稳定。

清乾隆年间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决策,是在清朝统治者的决策、新疆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察哈尔蒙古自身特点的合力之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察哈尔蒙古西迁符合新疆发展的历史需求,促进了新疆的发展与建设。

参考文献

- [1][6]祁士韵.西陲要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98.125.
- [2][3][4][7][8][10][11][12][13][14][15][16]吴元丰.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案全译[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2-3.3.25.1.1.3.25.37.2.6.68.91.
- [5]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丁巳条)[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478.
- [9]吴丰培.新疆回部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33.

【责任编辑:王 崇】